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 发生史

李建中 主编

《礼记》卷：

礼以节情
乐以发和

刘金波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

主编 李建中
副主编 唐铁惠 张杰

《礼记》卷：礼以节情 乐以发和

刘金波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资助
本卷课题受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礼记》文论发生及流变研究』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记》卷:礼以节情 乐以发和/刘金波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2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李建中主编

ISBN 978-7-307-07378-4

I. 礼… II. 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 ②礼仪—中国—古代 ③礼记—文学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I206.2-53
②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894 号

责任编辑:黎晓方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通山金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8.25 字数:257千字 插页:2

版次: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378-4/I·372 定价:98.00元(共三卷)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

《礼记》卷：礼以节情 乐以发和

刘金波 著

《老子》卷：道法自然

高文强 著

《庄子》卷：得意忘言

王杰泓 著

卷 首 语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

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中国文论的枢机和关键。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孕育并生长于儒道文化元典。

只有清理儒道文化元典中的文论范畴，方能开启中国文论之枢机，方能重睹中国文论之神貌。

20 世纪，在西方文论的理论框架内组合中国文论范畴。

21 世纪，回到中国文化元点（元典），重释中国文论范畴。

总 序

中国古代文论在其滥觞期（周秦诸子时代）没有独立成体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或专篇，其文论思想的言说或表述主要采用“词语寄生”的方式。也就是说，先秦文论的理论范畴或曰“关键词”大多寄生在各种非文论体式的文化典籍之中，如《老子》的“道”、《庄子》的“言”与“意”、《礼记》的“乐”与“和”，等等。这些非文论典籍中的文论关键词，构成了中国文论的元始和轴心，在中国文论几千年的传承及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理之根荑，文变之经脉，文心之载体，文境之诗眼。先秦之后，历朝历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在追根溯源之时，都别无选择地要回到先秦典籍的文论关键词。因此，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研究要清理本土资源，要实现文论传统的现代转换，更加需要返回自己的元始和轴心。然而，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其基本路径是以西方文论为圭臬矩式本土文论，亦即“用别人的关键词做自己的文章”。中国文论有自己的关键词，但中国文论对自己的关键词缺少溯源寻根式的整理和固本举要式的研究。“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①我们这套《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发生史》，以发生学之方法研究先秦典籍中的文论关键词，旨在开启中国文论之枢机，进而真实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论异于西方文论的独有之“神”与“貌”。

《老子》四十章有“反（返）者道之动”，按照王力先生的说法，此语为《老子》全书之纲领^②，“返”（“复”、“归”），不仅是

①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② 王力：《老子研究》，天津古籍书店影印本1989年版，第1页。

老子对“道”之运行规律的揭示，而且是老子哲学和美学的方法论原则。刘勰精雕文龙，其文心之要虽然是征孔儒之圣，但实际上是儒道兼宗，其方法论之中依然有老子的“返”：返回先秦，返回五经，返回人文之元。我们知道，刘勰的基本忧患是“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因而刘勰的基本思路则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①。站在“返”亦即发生学的立场考察，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或“源”何在？寄生在先秦典籍中的具有文学理论内涵的范畴术语或曰“关键词”。我们今天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只有返回到滥觞之处，返回到先秦典籍中的文论范畴，才能够真正厘清中国文论几千年的“道之动”，才能够发掘出中国文论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才能够把握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内在关联，从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的“道之用”。基于此种体认，本套书入思的基本路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返”。本套书的撰写，借助先秦汉语史、古代史、文学史、批评史、美学史、文化史等具有发生学性质之学科的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为深入考察先秦文论范畴的发生和流变夯实基础。

先秦典籍中寄生着大量的文学理论术语和范畴，如何择选？我们的原则有三：文化性、本土性和元生性。所谓“文化性”，指文论关键词出场方式的“寄生”与“随意”：寄生于各体各式的文化典籍并跟随各家各派的文化意旨。本项目初步遴选对中国文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三部儒、道文化典籍（《礼记》、《老子》和《庄子》），清理并阐释其中的文论关键词。文学的最高境界与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相通的，文学的终极问题与哲学的终极问题更是统一的，这就是如何去言说或抵达那个不可言说也不可抵达的“道”。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是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开始的。道不可道，名不可名，意不可言；言不能尽意故要立象以尽意。因此，源于《庄子》的言意之辩，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问题，并贯穿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的文学始于风骚，风骚是言“情”的；而中国的文化始于五经，五经是明“礼”的。

①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因此，“情”与“礼”的悖立与整合又成为中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生命力。而这一生命力的底蕴在《礼记》，在《礼记》的发乎情，止乎礼，兴于乐，至于和，在《礼记》的以礼节情，以乐发和，以和为美。由此可见，我们这套书所精选的文论关键词，都是关乎中国文化与文论的根本要旨和基本问题的，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最高境界与生命力之所在。

所谓“本土性”与“文化性”相关。先秦典籍中的文论关键词是华夏文明所固有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和经验，秉承着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精神和气质。在这个意义上说，除了音译之外，它很难一对一地移译为另一种语言。比如《老子》的“道”怎么翻译？译为“道路”、“道理”、“规律”、“方法”或者“太极”、“太一”、“无”、“无为”，等等，都对，也都不对。因此，用“dao”来翻译“道”是别无选择之选择：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而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说”是一种最接近“道”的状态，甚至就是“道”本身了。在先秦文论中，道家的“道”与儒家的“道”大不一样。即便是在道家的理论体系之内，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也是有区别的：前者常常从形而上垂直降落到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层面，成为治国之道，成为处事之道；后者虽然也会降落到“人间世”甚至去“应帝王”，但就“道”与文学理论的关系而言，庄子的“道”更多的是“心斋”、“坐忘”的心灵之道，是“神乎技”的审美创造之道。只有在汉语言的语境下，在中国本土文化固有的根柢之中，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中国文论范畴的原初释义及发生学内涵。

所谓“元生性”，指本项目所整理和研究的文论关键词，在其所表述的特定领域之中，是最早的（本源），也是最根本的（本原）。因此，凡与它相关的术语、概念和范畴，都以它为词根或者说从它的根基上生长出来。我们以“文”这一关键词为例。《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可见“文”在先秦典籍中含有“彰彰”或“文章”（即色彩或线条相杂之花纹）之原始义。在语言文字以及用文字书写成的文章（“文章”之后起义）出现之前，“文”或“文章”早就存

在了。当文明时代的文化人用（原始义之）“文章”来指称他们书写的（后起义之）“文章”时，是要表明他们写出来的文章如后皇嘉树般灿烂炫目、采绘照人。所以，《文心雕龙·情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道不可见而文可见，道不可说而文可说，所以刘勰“原道”，要从天地之“文”和人之“文”说起，因为“文”实际上是“道”的符号化或文本化，借用老黑格尔的话说，是“道”的感性显现。只有在元生性的层面理解“文”，我们才可能理解由“文”所衍生出的或者说以“文”为词根的一系列文论范畴：“文采”、“文辞”、“文饰”、“文绣”、“文明以健”、“文质彬彬”，等等。

我们这套书在学术界是首次从“发生史”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首次在先秦儒道文化元典中清理文论关键词的孕育、发生和演变。考虑到19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多在西方文论框架内展开”这一理论现实，故本书的问世将推动新世纪中国文论的理论重构和现代转换。另一方面，本书作为汉语言文学类的学术书籍，可供文学和文学理论爱好者阅读；同时，本书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史料性，可以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的教学参考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本书的出版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这套书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语言文学典籍整理与研究中心”配套课题的最终成果，此项课题从设计、立项、中期检查到最终成果的撰写和修订，始终得到中心主任、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宗福邦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而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武汉大学出版社陈庆辉社长和陶佳珞编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李建中

己丑年春节于东湖名居寓所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礼	16
第一节 夫礼，必本于大一	19
一、自然法则：礼者，天地之序也	23
二、天命之性：礼因人情而为之	28
三、人道之始：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32
第二节 礼者，即事之治也	39
一、礼之功用：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	40
二、礼之构成：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47
三、礼之表现：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53
第三节 礼也者，理也	56
一、礼与诗：诗之所至，礼亦至焉	59
二、礼与情：发乎情，止乎礼义	69
三、礼与法：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	75
第二章 情	87
第一节 情，实也	88
一、范畴原始：人之阴气有欲者	89
二、义项探微：情，性也	92
三、审美溯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 弗学而能	98
第二节 情者，性之动	100
一、情之属性：无情者，不得尽其辞	100

二、情之发生：应物斯感，情以物迁·····	106
三、情之升华：高下任意，情伪由己·····	111
第三节 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117
一、情与景：一切景语皆情语·····	117
二、情与性：利贞者，性情也·····	123
三、情与理：夫情必依于理，情得然后理真·····	131
 第三章 乐·····	136
第一节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	138
一、深层本体：乐者，天地之和也·····	139
二、现实来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	144
三、表现形态：乐由中出故静·····	147
第二节 乐者，通伦理者也·····	150
一、乐之功用：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150
二、乐之机理：乐以和其声，致乐以治心·····	154
三、乐之准则：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156
第三节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158
一、乐与声律：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	159
二、乐与通变：五帝殊时，不相沿乐·····	163
三、乐与致味：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	170
 第四章 和·····	181
第一节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181
一、宇宙之和：阴阳和而万物得·····	182
二、人伦之和：礼之用，和为贵·····	185
三、审美之和：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	187
四、关系之和：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	192
第二节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05
一、和与同：君子和而不同·····	206
二、和与分：物相分而不失其和·····	219
三、和与谐：和者，谐也·····	226

四、和与合：保合太和乃利贞	234
五、和与一：审一以定和	238
第三节 顺气成象，而和乐至焉	244
一、和与文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44
二、和与情景：情景互藏其宅，合而为一	249
三、和与意境：意与境浑，思与境偕	251
结 语	260
参考文献	263

绪 论

泱泱中华，“礼仪之邦”。礼仪之邦的直接结果是礼学研究蔚成风气。所谓礼学，狭义的是指礼经学；广义的礼学，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包容这若干研究内容的礼学，成为中国古代礼文化的核心；而以礼经学、礼仪学、礼论研究为载体的中国古代的礼文化，是以“礼治”为内核，由“礼制”、“礼仪”、“礼教”、“礼学”、“礼器”等若干层面内容汇聚而成的。

在祖先为我们留下的汗牛充栋的文化宝库中，名称肇始于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作注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也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重要来源。

《周礼》，原称《周官》，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周礼》传说为周公旦所作，近人定为战国时作品。“周”字或以为指“西周”，或以为指“周天之官”。《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周礼》内容极为丰富，主要讲述各种名物、典章、制度。吕思勉先生《经子解题》云：“《周礼》则本为言国家政制之书。虽亦被礼之名，而实与《仪礼》之所谓礼者有别。故至后世，二者即判然异名。《周礼》一类之书，改名曰‘典’，《仪礼》一类之书，仍称为‘礼’。……古书中独《管子》所述制度与《周官》最相类。《管子》实合道、法、纵横诸家之言他，固所谓阴谋之书矣。故此书与儒家《礼经》，实属了无干涉。亦必非成周旧典。盖系战国时人，杂采前此典制成之。……然窜乱则有之；全认伪撰，固理所必无；则固足以考见古制矣。……当二千余年前，而有如《周官》之书，其条贯不可谓不详，规模亦不可谓不大。此书之可贵，正在

于此。”^①章太炎先生云：“《周礼》初出曰《周官经》，刘歆始改称《周礼》，然《其略》犹曰《周官》，《汉书·艺文志》仍之。马融训释之作，亦称《周官传》，至郑康成以《周礼》名之，合《仪礼》《小戴礼》为三礼。”^②“后之论者，以王莽、王安石皆依《周礼》施政而败，故反对《周礼》。余谓二王致败之由在不知《周礼》本非事事可法，只可师其意，而不可师其迹。”^③

《仪礼》简称《礼》，亦称《礼经》或《士礼》，晋代始称《仪礼》。旧说《仪礼》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先秦、西汉所谓“五经”之《礼》皆指《仪礼》。《仪礼》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地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礼记》，一般指西汉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率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等四十九篇。“三礼”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价值取向、思维定势、文化传统、伦理观念等影响很大。

关于“三礼”，皮锡瑞《经学通论》认为：

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记》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

① 吕思勉：《经子解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7～48 页。

②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4 页。

③ 章太炎：《国学讲演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2 页。

皮锡瑞所论《礼记》名称之由来，是相当科学准确的。

对于“三礼”中编纂于西汉时期的《礼记》为何称“记”，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解释云：“逮夫子既歿，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其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记”、“传”之义基本相同，只是“记”则更侧重于对以后所出现有关礼的问题的探讨与记述，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华民族所起作用更不容小觑。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孔子的弟子、门人和儒家后学传习《礼经》的“记”的汇集，是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是春秋末年和秦汉之际儒家学者对“礼”的解说、补充和有关论文的汇编。该书自唐代初年李世民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列入经书之中，取代了《仪礼》从战国以来在儒家经典中不祧之祖的地位。它不仅是一部积累起来多科性的学术史，也是我国反映秦汉以前社会现实的一部社会生活史。

《礼记》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一般认为非一时一人之所作。即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也不是完成于同一个时期、同一个社会环境之中，它是春秋末年至秦汉之际关于“礼”的解说、补充文字和有关论文的汇编，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汉书·艺文志》则认为此书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较为公允。《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分。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

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所以一般意义上，《礼记》又称《小戴礼记》，为汉宣帝时传习礼学的著名礼学家戴圣所编，全书四十九篇。它汇编了战国至西汉儒者论述当代礼俗及拟古说礼的文章，也不乏从同时代其他学术著作杂抄来的一些关乎礼仪的篇章。它是中国一部关于先秦典章制度及儒家思想的学术性文集汇编，实际上，这部近十万字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在礼文化研究中，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相传其为戴圣所作的《礼记》（《小戴礼记》）是礼学研究的重要典籍。戴圣是汉代著名的礼学家，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至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的三十年中，以《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为依据，编选《礼记》四十九篇，配合今文《礼》教授弟子，传授礼学。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所以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启超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

一定参考价值。

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我们现在所知关于戴德、戴圣对《大戴礼记》及《礼记》的编纂有一定作用的最早证据见于郑玄（127—200）的《六艺论》。《六艺论》早已失传，仅存一些佚文。孔颖达（574—648）的《礼记正义序》引述了《六艺论》的下述文字：“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当然，学界并没有发现其他直接证据证明孔颖达所引属实。其他关于“礼记”一词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汉书·景十三王传》、《汉书·艺文志》、《汉书·韦玄成传》、《说文解字叙》及三国魏张揖的《上广雅表》。如：

《史记·孔子世家》曰：“故《书传》、《礼记》自孔氏。”^①又《史记·儒林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②司马迁所说《礼记》即今之《仪礼》。

《汉书·景十三王传》曰：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士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③

① 司马迁：《史记》。

② 司马迁：《史记》。

③ 班固：《汉书》。